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0年报告文学:

当“轻骑兵”遇上非常年

□刘浏 丁晓原

2020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中国报告文学亲历着、见证着、书写着。在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在决胜脱贫攻坚的火热一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中国创造的金字塔尖、在不忘初心的追忆里、在人世间的万家灯火中,这个被称为“文学轻骑兵”的重要文体,发挥着它的使命。

热点速递,吹响战疫书写的集结号

刘浏:报告文学是时代文体,与时代共振。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报告文学作家们都是逆行而行,冲进生活暴风眼,抓拍现实冲击波。《中国作家·纪实版》在第一时间开辟了“中国作家抗疫特辑”,发表了李朝全的《一心赴救 无惧生死》、纪建国的《湖南行动》、丁燕的《人间烟火三十天》、王威廉的《严重的时刻》、张红霞的《战“疫”记》以及金艺的《邮轮上的阳光与暗影》等20多部作品。不仅有对武汉、黄石等地疫情蔓延时的深入采访,描写中国战疫一线的情况、各行业在疫情最严重时的真相,还叙写了疫情下的医生、护士、普通个体的真实生活。《人民文学》也有数期的头条为战“疫”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那些匆匆而过的英雄本来如此平常》记录战“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专车”司机等,《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叙述了华西医疗队令人动容的故事,以他们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们高尚的医德,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年已花甲的上海作家程小莹创作的15万字纪实长篇《张文宏医生》,用“沉浸式”的访谈方式,以作家的眼睛默默观察写作对象,将张文宏真实的工作、为人、处事的细节转化入作品,大量口述“解密”了张文宏的硬核与柔软。《钟南山逆行的72小时》是部短篇作品,结构精巧,讲述了在新冠肺炎病毒的定性问题上得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始末。李春雷的《感谢纸尿裤》巧妙地抓取细节,笑中带泪,令我们因有这样的医务工作者而倍感安心。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特别关注“90后”“00后”群体,比如1986年出生的湖南作家曾散,疫情期间也是第一时间奔赴湖北,采访和书写青年群体的战疫,他笔下的《温暖的光》照亮了三位白衣天使——余沙、邓小丽和张琴,《甘心》中的甘如意四昼夜单骑逆行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生命的节点》里护士贾娜染病后自愿回家隔离治疗、康复后毫不犹豫捐献血浆并第一时间提出归队申请……这些作品叙述朴实,却写出了青年一代面对艰难时的勇敢与担当,让人感动、振奋。

丁晓原:确实,2020年是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考,其中包含着种种重要而丰富的信息,需要文学及时记录和表现。报告文学是最能应急的文体,是最可组织化响应的“快手”。中国作家协会快速组织多位作家参与抗疫采访,奔赴武汉“战场”,承担着文学战士的使命。这些作品成为读者当时了解疫情悲伤和抗疫中人间温暖的真切现场报告,其后,又推出了《武汉保卫战》(李朝全)、《武汉纪事》(李春雷)等中长篇作品,是报告文学作家抗疫书写的重要成果。一半等合作的作品,取材特异,结构新颖。四个“乐章”演奏多声部的抗疫交响曲,真切有味。大疫当前可以透视举国同心、人民至上的伟力和情怀,而其中能够记述自己难忘经历的医生作者是最可敬的写作者。《查医生援鄂日记》是一部具有特别价值的重要作品。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查琼芳医生是一位有人文,她将自己在北京一线抗疫的经历以日记的方式加以记录。作品没有宏大的叙述,有的只是相关者的原生态叙事,因此更具“抗疫档案”的真实意义。张培忠、许峰的《千里驰援》以钟南山和广东医疗队“团圆夜亦是出征时”诸多细节和场景的特写,再现了广东“逆行者”的驰援和大爱。李琼璐的《我来自北京》中的“我”是一个复数“我们”,作品叙写北京医生护士,以各自“奋不顾身的理由”,选择人生的“最美逆行”。

武汉是2020年度抗疫的主战场,身在这一核心区的本地作家有着深切的身心感受,其写作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中,生命为其关键词,作品以生命确证生命。作为一部“全景报告”,更有着一题材写作中难得的全息价值。晋玄的《疫中之歌》选取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镜头,细微而真实,别有叙事的质感。何建明被计划外“留在”上海,但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感驱使他将“计就计”走向医院、社区、航空交通枢纽等,写出了《上海表情》《第一时间》两部抗疫作品。作品通过上海的抗疫经验书写,试图回答面对突发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如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治理这样宏大的时代之间。

脱贫攻坚,第一主题写作的大会战

丁晓原: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是反映这一主题最为便捷而得力的方式。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组织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20多位作家奔赴各地脱贫攻坚的现场,亲历决胜脱贫、旧貌换新颜的伟大事业。可以说,2020年度的这一主题是一场最为壮观的国家文学行动。老中青作家齐发力,脱贫攻坚大叙事异彩纷呈。何建明《诗在远方——“闽宁模式”脱贫攻坚纪实》、李春雷《金银滩》、李迪《十八洞村的十个故事》、徐锦庚《洞溪春晓》、许晨《山海回东》、任林举《出泥淖记》、艾平《春风染绿红山下》、关仁山《太行沃土》、毛永平《神山印象》、丁燕《岭南万户皆春色》、丁一鹤和毛永温的《厚土中国》、罗长江《石头花开》、王国平《一片叶子上的重量》、王鸿鹏《那片江峡》、陈新《云上光輝》、陈果《古路之路》、凌翼《新征程 再出发》、张雪云《桃李春风——湖南教育扶贫纪实》、王丽君《三湘网事》等无法备列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取材和视角,讲述了精彩纷呈的脱贫奔小康故事。

刘浏:可以看到,报告文学对这一题材的挖掘,

已比较全面和深入。前有典型人物的书写,再有深入湖南、贵州、江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宁夏等地的“驻村”采访,又有儿童文学、青年视角、生态报告等各类叙事,拓展了脱贫攻坚这一主题的创作宽度与深度。哲夫以生态报告文学闻名,但他也同样长期关心着贫困问题。《爱的礼物》以山西省岢岚县脱贫为中心,生动描述了岢岚县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改变自身命运的现实情况。何建明的《诗在远方》聚焦曾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讲述了“闽宁模式”的形成、开展与成功,展现出脱贫攻坚战中的中国智慧与人间真情。李春雷走进徐海成一家,通过记录这些年胜利村村民身上看得见的变化,写出了精准扶贫的效用、中国乡村的变化。许晨来到福建宁德,书写了它从“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无财政收入、无办公地点”的“五无”地方到赤溪“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华丽转身、异地搬迁“长安新街”的风情姿态、霞浦“光影小镇”的美丽、“天湖”三都澳的海上人工养殖渔场,以报告文学之名诠释“闽东精神”的内蕴。

老将们一马当先,少将们勇于创新。四川作家陈果的作品给我耳目一新的感受,他的文字具有识别度。《古路之路》不仅描写古路本身,更是不断进行自我对话,外部世界的真实和作家的内心构成内外循环,通过报告文学的方式输出,给人惊喜。杨丰美的《湘村巨变——湖南脱贫攻坚纪实》沿着北西南东的逆时针方向,走访了湖南省14个市州的40多个县(市、区),对湖南省的扶贫关注作了走读式的书写。李琼璐的《小康路上,因病致贫之痛》令人肝肠寸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为这些重症患者及家庭呼喊——“没人可以挣脱疾病的枷锁,但亟待建立更为完善的医保制度,更加关注困难群众”的“看病难”“用药贵”等问题。

丁晓原:在2020年脱贫攻坚写作中,军旅作家徐剑是一位特别能打硬仗的“勇士”。他的长篇《金青稞》是一部关于西藏精准扶贫的纪实。这是徐剑“环西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弧”,历经50多天艰难采访所得的收获。徐剑和李玉梅合作的另一部脱贫攻坚作品《怒放》叙写云南独龙族脱贫致富、独龙族地处中缅边境,采访山高路远。这是一个独特的“直过民族”,新中国使它从原始社会状态一步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新时代的独龙族告别千年贫困,开启美好的小康生活。《怒放》以全景色彩的笔调,将一个彩虹传奇用非虚构叙事加以呈现,读者从中可以遇见一种神秘而真实的独龙族风情。关仁山的《太行沃土》讲述的是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的故事。透过作者具有油画般质感的质朴而多彩的叙事,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阜平新传说”的美好与动人。

2020年度与脱贫攻坚主题写作相关的多部小康叙事作品也值得关注。湖南李健的《嬗变》描绘的是“油溪桥村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河南郑旺盛的《光明的道路》则是一部“弯柳树村奔小康纪实”,最具分量的当属由张培忠总撰稿、章石山写作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这是一部包括四卷100多万字超大体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是当代岭南的大史记,又是伟大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作品以大量客观详实的生动叙述,通过广东这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典型,大写了小康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再现了民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还有江苏作家章剑华的《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所写江村是费孝通《江村经济》之“江村”,将其置于百年历史演进中建构,具有纵深的历史性。

主题外的主题,映照在大地上的斑斓志

丁晓原:特定的时代生活自有其相应的主题话语,但主题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生活永远是漫溢在大地上的河流。2020年的报告文学除了以上热点主题外,还有许多作家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做多向观照,既有主旋律的高奏,也有多声部丰富的咏唱,一如生活本真那样五彩缤纷。何建明在写作抗疫热点和革命题材作品外,另有长篇《德清清地流》,展示的是经济社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浙江德清样本。《溪清德美》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美融合的新时代的伟大创造。陈启文的《中华水塔》从中国文化和全球生态文明的视野,多维度深写青海三江源这一神奇而博大的题材,文本建构既有地理,也有人文;既有现实,也有历史;既有客观叙写,也有多主体的沉思,读来厚重多意。

军旅作家高建国以其超常的脚力和卓然的笔力,写成厚重感人的《大河初心》。“风雨历程”是焦裕禄个人史的写照,同时也是被淹没浩荡的现代中国历史的纪实,直达现时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源头。江苏作家傅守军的《心中的旗帜》叙写电力系统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的事迹及团队平凡而崇高的精神。报告文学具有重要的介入现实的品格,因此主旋律以外具有反思精神的作作品难能可贵。徐江苏的《荣枯与沉浮——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三十三周年启示录》如题目所示,涉及的是一个重要话题,所谓“启示录”实际也是一种深刻的反思。

科技题材是报告文学重要的写作面向。黄传会的《“北斗”璀璨》报告“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建设,“璀璨”的是中国科技成就,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等科学家壮美的人生。叶梅的《安然》是一部报告文学与高科技“碰撞”的有为之作,也是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王国平的《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是一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物传记,以饱满的叙事再现了一代建筑大师的事业和人生的风采。

2020年度的历史写作也多有可观之作。高洪雷的《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一带一路”史料的新发现,打开丝路写作的新视窗,这里有着你所未见过的叙事基线不一样的历史风貌。朱洪海的《从延安出发》是一部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八路军女战士谢雪萍的口述史。张学思走出军阀家庭,投奔红色革命,大时代和个人史共构了一部人生传奇。刘川鄂是张爱玲研究的资深学者,《张爱玲传》有学术研究的丰富,但全

2020年,在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在决胜脱贫攻坚的火热一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中国创造的金字塔尖、在不忘初心的追忆里、在人世间的万家灯火中,报告文学这个被称为“文学轻骑兵”的重要文体,发挥着它的使命。

无学究的呆滞,洋溢着写作者的性情,既写出传主的“绚烂”,也凸显了她的“孤寂”,别有滋味。

刘浏:2020年是深圳特区建立第40年,陈启文的《什么是深圳》以宏大叙事记录了深圳这4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先行者,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下,最终找准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之路。刘元举的《荔园筑就的精彩》从深圳大学的成长看到了“深圳速度”、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以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中国大学奇迹。李朝全的《到深圳去——深圳发展奇迹的人密码》通过讲述数位人才的命运抉择,描绘出“孔雀东南飞、人往深圳走”的时代热潮,同时也揭开了深圳速度背后的人才秘籍。何建明的《革命者》第一次把当年上海地下党斗争与牺牲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作家将自己对革命者的敬意注入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之中,让读者们再次缅怀革命先烈,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由于各种因素所限,中国海外援建的文学书写极为罕见。王敬东和朱向军在受命采访中国核电名片“华龙一号”建设的过程中,“旁枝斜出”地聚焦了中核中原援建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项目。《“核”你一起点亮世界》不仅写了中国核电人做到了技术输出,更注重管理理念输出、“铁血”友谊的建立,填补了中国海外援建文学书写空白。《追梦之歌》的写作对象是作者李发锁最熟悉的那座城市里的人,是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校长李国荣和她的团队。他们代表着热爱职业、艰苦奋斗的追梦精神,李英的《大国治村》从“浙”里解读乡村振兴,聚焦“三治融合”路径,记录基层治理现代化。向剑波的《致命的诱惑》揭秘近年来各种金融诈骗,正中民生问题的热点与痛点,对老百姓“守住钱袋子”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

另有镜像,女性非虚构的色调

刘浏: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潜心于报告文学的写作,使得2020年的报告文学刚柔并济、色彩斑斓。《一个二胎母亲的怀孕经历》中的“听梅”,与2015年国家开放二胎政策后的许多二胎妈妈一样,有相同的困扰、希冀和担忧:当经历过二胎全过程后,感恩是“我”留下来的最深感受。迎接健康生命、养育儿女,辛苦并快乐,要感恩生命;但并不是所有的准备都会有好的收获,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生命、如何处理因为新生命的到来而改变原有生活规律,是二胎家庭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李燕燕专访唐帅,一个出生在聋哑家庭的小伙儿,自学手语和法律,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服务,成为聋哑人最信赖的律师,《无声之辩》替唐帅表达心声,“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聋哑人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让这个特殊群体不再被边缘、不再被边缘化”。长江近年来特别关注生命的话题,尤其呼唤不要再让“生命教育”缺席。《“养老”革命》中的追问发人深省:该靠谁养老?行动不便时谁来照顾?身患疾病时谁来帮助他们挂号求医治病?怎样守住中国千百年来传统中的血脉亲情和赖以生存的家庭?长江坚持着她的“生命系列”,探寻着人与环境、人与自己、人与衰老,生命与死亡、时间与永恒的问题。

丁晓原:现在流行的非虚构说法取自美国。美国现在的非虚构大约包括了我们的非虚构和报告文学,而我们这里似乎是两个互不联通交集的“朋友圈”。在我看来两者其实共有一个“同心圆”,只是各自直径不一样而已。非虚构文学的倡导在客观上打通了写实类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促成了报告文学写作题材逼仄和写法模式化的部分改变。其中女性非虚构的写作更显示出独特的价值。2020年度女性社会学题材的写作尤显亮点。广东作家彭名燕的《用爱吻你的痛》写的是中国救助的深圳故事。作品中的人物是城市救助站中的救助者、志愿者和受助的生活无着者。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对待无助者用心用情的救助,显示出它人性的温度和现代化应有的高度。江苏作家修白的《天年》以自己的视角记述了发生在老年护理院中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不一,相关问题关联医学、社会、家庭,人性景观在这里了然可见。陕西作家杜文娟的《岩兰花开》是一部“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这是一个极有社会价值的题材,作者以不易的采访,书写出一个作家对幸存者特殊的人文关怀。湖北作家周芳的《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是一种题材特殊的非虚构写作。周芳以近一年半的“上班”体验,将两个非常时空中的日常存在以非虚构方式加以呈现,既打开外在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打开自己的心灵感受,在主客体交互复合中,真实多维地写实了一种生命哲学。

关注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究竟在哪,近日又有新说,让这一本该精明却一直未受重视的问题浮现出来。在我看来,廓清网络文学的起点,不只为追溯一种事实真相,更在于给中国网络文学找到一个可供认同的时空坐标,以确立起文学实践与观念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合法性,让这一文学的“来路”与“去向”在观念建构时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

一直以来,网文界的约定俗成是把1998年默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元年”,其根据是基于一个重要事件,2008年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等20余家文学期刊和众多媒体的积极响应,产生了广泛影响,于是人们便将1998年默认为中国网络文学起始年。这一认定也依据两个标志性事件:我国第一家大型原创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于1998年开始公司化运营,当时颇有影响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诞生于1998年。这种以文学高光事件认定网络文学起始年的观点,可称作“事件起源说”。

新近出现的另一种观点可称作“论坛起源说”,是由邵燕君、吉云飞提出的。《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是金庸客栈?》(《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一文提出,1996年8月成立的金庸客栈及其开启的“论坛模式”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理由是:网络文学的起点只能是一个网络原创社区,而不能是一部作品。金庸客栈是中国最早以文学为主题的网络论坛,这种“论坛模式”天然具有网络基因,即去中心化、网友自由发帖、多点互动等“趣缘社区”性质,具备网络文学生产的“动力机制”。文章认为,被称作“网上《收获》”的“榕树下”走的仍是投稿、审稿、编发的传统文学路子,算不得网络文学起点;而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998年)晚于罗森的网络长篇《风姿物语》(1997年),将其算作中国网络文学起点更是于实不符、于理无据。因而提出:“为什么金庸客栈应该被锚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其依据按重要性排序,首先是论坛模式的建立,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其次是趣缘社区的开辟,聚集了文学力量,在类型小说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成绩,积蓄了能量;第三是论坛文化的形成,成为互联网早期自由精神的代表。”

应该说,“论坛起源说”从文学网站功能和网络文学的文化底色来锚定起点,较之传统的“事件起源说”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其他附加因素而回归“起点”的本意;抑或说,如果我们承认网络文学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媒介载体而“创生”于网络的新型文学,那么,就只能回到这一文学的原初现场,选择“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即如前文所说的“用事实回溯的办法,而非概念推演”,我们将会得到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结论——中国的(汉语)网络文学诞生于1991年的美国,1994年中国加入国际互联网后才穿越赛博空间而挺进中国本土,并延伸壮大出蔚为壮观的中国网文世界。基于这个可供验证的时空节点,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个“网生起源说”更具真实性与逻辑合理性呢?

网络文学皆因网络而“生”,而“网生”文学需要两个基本要件:一是技术基础,二是文学制度。前者为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媒介载体和传播平台支持,后者则让网络文学形成机会均等的生产机制和互动共享的话语权分发模式,而1991年诞生于北美的汉语网络文学就最早具备了这两个要件。计算机和互联网均创生于美国,1991年,伯纳斯·李研发的万维网实现商用,消除了Internet去中心化平权架构信息共享、多点互动的技术障碍,使下移的文学话语权在消解传统的文学圈层后,实现了“人人皆可创作”的新型文学制度。这个被尼葛洛洛帝称之为“划时代分水岭”的媒介革命,唤醒了文学网络化的努力,促成了文学与网络的“联姻”,文学才有了实现“网生”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技术和制度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1年4月5日,全球第一个中文网络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在美国创刊,虽然它还不是纯文学网刊,但却是世界上中文网络文学写作的第一个园地。创刊号上发表的《太阳纵队传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汉语网络原创散文;4月16日《华夏文摘》第3期发表的《不愿做儿皇帝》,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网络原创散文;4月26日《华夏文摘》第4期刊载的舒婷的《读杂志时的寂寞》是网络上首次发布的诗歌作品,而该期刊的《文如其人》,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语网络文学评论;11月1日《华夏文摘》第31期发表的《鼠类文明》以拟人的手法描述了老鼠的一次聚会,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语网络原创小说。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文摘》是可以刊发文学作品的网络园地,并承认上述这些作品属于网络文学,那么很显然,它们均出现在“榕树下”和“金庸客栈”之前,也比《风姿物语》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要早好几年!有鉴于此,将1991年锚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就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判断,“网生起源说”无非陈述了一个客观史实。

当然,如此界定还有两个疑问需要解答。一是诞生地疑惑。那个最早出现的“网生”文学是在美国而不是中国,能算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吗?事实上,网络原创的文学作品,只是用汉语(海外称“华文”)表达,并且是刊登于汉语网络平台(无论它是网刊、网站、论坛或个人主页),对于没有国界的“网络地球村”来说,计较诞生于哪一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网络文学的辨识只有语种区别,并无国家或地区的界限,世界上以汉语为母语的网络文学都可算作是中国网络文学,何况诞生于北美的网络文学本是由华人留学生之手。另一个疑虑是该文章所说的网络文学诞生需要自己的“新动力机制”和自由的文化品格,即诞生于互联网环境中的论坛模式拥有自己的“网络基因,去中心化,网友自由发帖,多点互动”特征,以此成为网民同好聚集的“趣缘社区”和精神家园。这些要素无疑是网络文学生产和文学网站最具文化价值的功能范式,是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在它诞生伊始就具备的。换句话说,它们只是网络文学产生的充分而不是必要条件,缺少它们,网络文学可能不成熟、不完善,但并不会影响网络文学的诞生,没有任何一种新生物一出现就是成熟的、功能齐备的。

回到“网生起源”的话题,我们不妨沿着1991年4月《华夏文摘》诞生这个时间节点,探寻中国网络文学从北美发端,经由港台到中国内地而触点延伸、直至发展壮大技术路线。我们发现,继《华夏文摘》问世之后,同年12月,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王笑创办了全球华文网络第一个纯文学交流群“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1992年6月28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国留学生魏亚桂在Usenet上申请了一个使用GB-HZ编码的华文虚拟空间“中文互联网新闻组”,促使中文网络文学开始在全球互联网上传播开来,许多国家的华人留学生纷纷建立汉语文学网站、网刊、论坛或主页,如美国“威大通讯”“布法罗人”“未名”“心社”“加拿大“联谊通讯”“枫华园”“红河谷”“窗口”“太阳升”、德国“真言”、英国“利兹通讯”、瑞典“北极星”、丹麦“美人鱼”、荷兰“郁金香”、日本“东北风”等。港台地区互联网普及得较早,网络文学也得风气之先。在台湾,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1992年就建立了网络BBS社区,台湾政治大学创办了“猫空会馆”,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分别有“椰林风情”和“猫咪乐园”论坛,随后又出现了“妙缘阁”“涩柿子世界”等专门刊发文学作品、起文作品的文学主页,以及颇具规模的“鲜网”“冒险者天堂”“新月家族”等文学网站,涌现出罗森、痞子蔡、九把刀、姚大钧、李顺兴、曹志凌、代瀛、苏绍连等早期扬名海内的网络大神。香港诗人杜家祁1997年创办的“新诗通讯站”颇有影响,但其网络文学不以网络平台聚焦,而是以武侠小说、玄幻小说科幻小说等非虚构作品影响了内地一批网络作家。

1994年4月20日,中国功能加入国际互联网后,全世界华文网络文学迅速回归母语故土。翌年8月,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线,“北邮BBS”“天涯社区”“猫扑”等一批文化(文学)论坛迅速涌现,榕树下、清韵书院、红袖添香、中文在线、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还有潇湘书院、龙的天空、黄金书屋、白鹿书院、博库……形成了千禧年前后“文青式”网络文学的第一波高峰。2003年起点商业模式建立,刺激了类型小说的爆发式增长,文化资本的大范围介入打造了盛大文学、阅文集团这样的超级平台,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家网络文学上市公司(中文在线、掌阅科技和阅文集团),并不跨越文学边界以IP版权方式进入影视、游戏、动漫、出版、演艺、周边领域,实现市场分发的全媒体、多版权经营,直至延伸传播半径,让源自海外的网络文学以文化软实力的自信开启“出海”之旅,打造了世界网络文学的“中国时代”。

现在,当我们回溯中国网络文学“生于北美→成于本土→走向世界”的生长线时,以“网生起源说”来锚定它的起点,当然不只是为了厘清一个事实,或者执着将生辰前置而为网络文学争得某种荣光,而是为了找准历史原点,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学“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廓清这一文学的正根和主线,以历史自觉而明史鉴今,让未来的网络文学发展行稳致远。

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

□欧阳友权

